

史地小叢書

東漢宗敎史

宋佩章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
佩

書
編

小史
叢書
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章

東漢書

宗教史

(原名東漢之宗教)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徐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國難後第二版

(25334•1)

史地東漢宗教史原名東漢之宗教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宋佩

發行人

王雲章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五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印有究

目次

第一篇 儒教

第一章 儒教的極盛

東漢儒教極盛的原因——宗教與教育的關係——國立學校的發達——私家教授的極盛——東漢的經學及其分派——東漢諸帝皆受經

第二章 儒教的變遷

宗教變遷的必然性——儒教與方士的混合——光武帝的迷信識緯——六經與七緯——七緯的名稱——緯書中的孔子——五常與三綱——東漢儒者對於識緯的態度

第二篇 佛教

第一章 佛教的輸入

東漢前佛教東傳說的批評——漢明求法說辯僞——楚王英的奉佛——真正
佛教教理的輸入時期——安世高與支婁迦讖——佛教的輸入地——佛教先
盛於北或先盛於南說的批評——漢代禁中國人出家

第二章 佛經的翻譯

初期譯界的代表人物——初期翻譯的經典——中國人的譯經者——初期譯
經者所傳的教義——初期譯界的狀況——初期所譯經典之內容的一斑

第三篇 道教

第一章 道教的起源及其依託

道教非淵源於老子——道教與墨子的關係——老子哲學的真諦——道教依託老子的原因

第二章 道教的開創及其完成

張陵的身世——五斗米道的內容——漢天師世家所記述的張道陵——符錄派與丹鼎派——魏伯陽及其參同契——道教的經典——道教的流派及其化合

第四篇 三教的相互關係

本書的結論——儒道兩教的相互化合——漢儒對於佛教的認識程度——佛道兩家的混和——佛道兩教衝突說辯僞——三教調和說非起自東漢——牟子理惑論辯僞

東漢宗教史

第一篇 儒教

第一章 儒教的極盛

自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儒教遂成爲國教。到了東漢，儒教之盛，達於極點。

儒教之成爲宗教與否，近代學者頗多爭辯。（註二）但我們把儒家的重要經典加以研究，僅中庸一書，已經差不多是宗教的整個的一個系統。（註二）而這個系統，根本是封建社會支配階級的心理，所以歷代帝王都利用他以宰制天下。梁啓超說：「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子弟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爲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

上，取儒冠以資洩濶；及既定大業，則適魯以太牢祀矣。蓋前者則孔學可以爲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爲之奧援也。」（註三）這幾句話，把當時君主尊崇儒教的原因說得很透切。然儒教在西漢初雖已爲時君所重，而儒教以外諸學派的勢力尙盛。所以漢初博士一官，不盡用通經之士，還是承襲秦時諸子百家各立博士的制度。（註四）到了武帝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儒教獨尊之局遂定。光武少時，曾往長安受尚書，他本是一個儒者，不同於儒冠置溺的漢高祖。又東漢中興功臣多近儒，不像西漢開國功臣之大半出於亡命無賴。（註五）所以光武既定天下，便承前朝流風，極力提倡儒教。光武以後的幾個皇帝，大都能繼承先人遺志，對於儒教的提倡不遺餘力。因此，東漢儒教之盛，遠非西漢可比。

漢武表章六經，已定下了儒教教育的方案。到了東漢，國立學校，生徒多至三萬餘人；私家教授也盛極一時。

宗教和教育是有密切關係的：在階級對立依然存着的社會，宗教每做了支配階級的武器，而教育就是使用這武器的一種方法。西洋教育起於第四紀天主教之創始，凡稍研究

宗教史者，任誰都知道的。在西洋教育史上皇帝幫助教會推行教育，要大家讀『聖經』和我們中國古代皇帝的表章六經，要大家讀儒教的經典，用意是一樣的。武帝表章六經，『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就是把儒教以外的經典摒出了教育的範圍。據王國維的考證，漢人受書次序，起首是小學（就是教兒童識字習字），其次是孝經論語，再其次是一經（即五經中任何一經）。（註六）照現代制度來比喻，小學是小學校的科目，孝經論語是中學的科目，五經是大學的科目；而博士就等於大學教授。武帝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到了成帝末年，增至三千人。然以視東漢，則猶瞠乎其後。後漢書儒林傳說：『光武中興，愛好儒術，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公元二九），乃修起太學。……明帝卽位，復爲功臣子弟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停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囊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本初元年（一四六），梁太后詔曰：『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遊學盛增，至三萬餘生。』又黨錮傳亦稱『太

學諸生三萬餘人。」我們於此可以窺見東漢國立大學的規模宏大，學生衆多，遠非西漢所可比擬的了。

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官，非詣博士，不得受業。雖間有私授，但其傳不廣。東漢則私家講學之風極盛；其門弟子少者常數百人，多者且萬餘人。如後漢書所載：牟融、郎顗、桓郁、桓典、張酺、李恂、史弼、劉淑、劉昆、注丹、魏應、薛漢、丁恭、周澤、甄宇、程曾、李育、劉茂、廖扶、唐檀、法真等，皆以私家教授，弟子常數百人。樊儻（本作儻，依注改）丁鴻、姜肱、鍾皓、曹曾、宋登、楊倫、杜撫、張玄、穎容、謝該、夏恭、索盧等，弟子或千餘人，或數千人；而樓望門下者九千人，牟長萬人，蔡玄萬六千人，尤稱極盛。此外但言居家教授，不說明弟子若干人的，尙指不勝屈。

東漢經學之盛，亦超越前代。皮錫瑞著《經學歷史》，常舉東漢經學盛於西漢者有二：（一）西漢多專一經，很少能兼通數經的。像申公、韓嬰、易孟卿，兼通詩、春秋；春秋，已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更屬絕無僅有。東漢則尹敏習歐陽尚書，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何休精研六經，許慎五經無雙。蔡玄

學通五經，尤爲西漢諸儒所不及。（二）西漢傳經僅憑口說，少有撰述。漢書藝文志所載，惟災異、孟氏京房易六十六篇爲最多。董仲舒春秋繁露，志不載。韓嬰作内外傳數萬言，今只存外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今已不傳。東漢則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詩解，又撰禮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餘萬言。趙壁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程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註訓孝經論語，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許慎作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賈逵集古文尚書同異三卷，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至鄭康成出偏注諸經，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註七）

復次，東漢諸帝都受經講學。桓榮以宿學授明帝尚書，備受恩遇。自明帝以下，史皆稱其受經淵源。桓氏一家三代，都以明經爲帝王師，且至於五帝。所以東漢諸帝提倡經學，不遺餘力。建初四年（七九），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五經同異，章帝親自臨制稱決，累月方罷。今所存白虎通義四卷，即當時諸儒的議奏，古義舊聞，所載頗多。靈帝熹平四年（一七五），

詔諸儒正定五經，蔡邕書丹，刊於石碑，立太學門外，以爲後世取則；（註八）尤爲一代大典。

在經學極盛的時候，有一事當注意的，就是經學中有今古文學的分派。（註九）經今古文名稱的對峙，在西漢末年纔發生的。『今文』就是漢時通行的隸書。西漢諸經師，都是口耳相傳所傳經文，就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到了劉歆等，才自謂能通史籀所造的『大篆』和『大篆』以前的『古文』。所傳的經如尚書、逸禮，都是武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之壁中的古文本。此外如春秋左氏傳及河間獻王所獻的毛公的詩，又都是古文舊書。劉歆當時想把這些古文經傳立於學官，曾和博士們起過劇烈的爭辯，有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載在漢書劉歆本傳。從此以後，人家稱這一派爲『古文學』，而稱西漢所傳爲『今文學』。以別之。到了東漢，古文學漸盛，如鄭衆、杜林、桓譚、賈逵、馬融輩，都是古文學的大師。今古文學兩派的爭辯，在東漢也有過幾次。但我們要知道，漢世所立十四博士，都是今文學。古文諸經，終漢之世，未得立於學官。惟東漢中葉後，博士的選擇，不如西漢之嚴。所以周防以治古文，尚書爲博士。盧植師事馬融，兼通今古學，亦爲博士。然當時實未立古文學，周防等蓋以古文學

家而爲今文博士（註一〇）（古文之立於學官，蓋在三國魏黃初之際。）所以東漢今古文學雖然對峙，但今文學的勢力較大。而況當時的皇帝都相信識緯，今文學家遂憑識緯以說五經。古文學家雖專究聲音訓詁，覃心於箋注，然如賈逵爲要立左氏傳，不惜稱引識緯，取悅人主；（註一二）馬融亦嘗考論圖緯；而今古文學的調和派，且爲緯書注釋（註一二）這樣看來，當時的所謂古文學派或今古文學的調和派，都不能擺脫妖妄的識緯之說，甚且還信賴他。因此，我們可以說：東漢今古文學兩派無論怎樣的爭辯過，無論這兩派對於六經排列的次序，甚至於對於經典的內容及經典裏面所稱述的孔子，有如何不同的觀念（實際上東漢經今古文家的壁壘，還沒有像清代今古文學家的森嚴。）然對於儒教的根本教義，還沒有多大影響。倒是識緯之書，把儒教重尊卑的教義，更定得嚴重了；把孔子的面目，完全改變了。在這裏，我只好把經今古文學的一樁公案，交給編經學歷史的，讓他們去詳細敍述罷。

（註一）近人如章炳麟，就不主張孔教是宗教，見章氏叢書太炎文錄二駁建立孔教議（浙江圖書館木刻版）。

又梁啓超初著論支那宗教改革一文，（見飲冰室全集），竭力贊揚儒教，然後數年又著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見

同上)以爲儒教性質與諸教不同故孔子不可謂之宗教家。

(註二)詳可參考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一篇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下篇(上海聯合書店版)。

(註三)見飲冰室全集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華書局版)。

(註四)詳見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中華書局叢珍版)。

(註五)詳見二十二史劄記卷四東漢功臣多近儒。

(註六)同注四。

(註七)以上根據皮氏經學歷史卷四經學極盛時代(本館學生國學叢書周予同標點註釋)。

(註八)按後漢書儒林傳稱:「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然據清杭

世駿石經考異,謂漢石經係一字,非三體。又言漢石經立於太學,非立於鴻都門。今依之。

(註九)關於經今古文學敘述得最簡明者,要推近人周予同君的經今古文學(本館國學叢書本,收入萬有文庫),可參閱。

(註一〇)關於漢不立古文學及周防等以古文家而爲今文博士,都根據王國維的漢魏博士考。

(註一)後漢書賈逵傳：「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又云：「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燒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註二)後漢書鄭玄傳：「會融（即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樓上。玄因從質諸義。」是馬融嘗習圖緯，而鄭玄又從而學之。玄傳又說：「凡玄所著周易……中候，乾鑿度，」中候即讖緯之書。又隋書經籍志論緯說：「宋均鄭玄並爲之註。」新舊唐書藝文志尙存鄭玄書緯三卷，詩緯三卷。即現存易緯八種，除乾坤鑿度外，其餘七種，也以爲是鄭玄註的。

第二章 儒教的變遷

無論何種宗教，他常隨着社會每個進展的階段上而有所變遷。例如原始共產社會的猶太教，一經耶穌的改革，便成爲奴隸社會的信仰；再經繁瑣哲學家的鉤通，便成爲封建制度的護符；三經馬丁路德的個人主義的改革，便成爲今日資本社會的武器。儒教也是這樣。梁啓超說：「寢假而孔子變爲董紅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

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菴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註二）這很能指出數千年來孔子面目之屢變。

儒教到了東漢，因五經家與方士的混合，不但孔子變換了面目，他的根本的教義，也和以前有些不同了。

儒教爲什麼會和古代陰陽家的苗裔——方士混合起來呢？這不能追溯到孔子創教時的態度。先秦學派中有所謂陰陽家者，專言術數鬼神，這一派勢力在春秋以前是很盛的。後來孔墨兩家各自創教，墨子言鬼神而孔子則頗取術數。如論語上所說的：「鳳皇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都有承認或利用術數的嫌疑。後來中庸等書出，儒教的整個的系統已漸完成。而中庸上所說的「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尤其帶極濃厚的術數的色彩。到了

西漢五經家好以陽陰五行附會經義，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有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有翼奉之五際六情。至於春秋，則公羊家尤好言災異，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所列求雨止雨的魔術，簡直分不出他是儒生還是方士。當時的儒生已和方士一鼻孔出氣，儒教的系統上又加上了一重原始迷信的色彩。近人章炳麟說：「及燕齊怪迂之士興於東海，說經者多以巫道相糅。故洪範舊志之一耳，猶相與抵掌樹頰，廣爲抽繹。伏生開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時適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驗火災，救旱致雨，與之較勝。以經典爲巫師，豫記之流，而更曲春秋，云爲漢氏制法，以媚人主而禁政記。昏主不達，以爲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倫，識緯蠭起，怪說布彰……則仲舒爲之前導也。……夫仲舒之託於孔子，猶宮崇、張道陵之託於老聃。」（註三）章氏是經學的古文派，他指斥西漢經師，常涉成見，然而這幾句話卻不是過分的。又夏曾佑在中國歷史中說：「儒者尊君，君者王者之所喜也。方士長生生者，亦王者之所喜也。二者既同爲王者之所喜，則其勢必相妬。於是各盜敵之長技，以謀獨擅，而二家之糅合成焉。」（註三）這幾句話，很客觀地很深刻地道出了當時五經家